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华

明史（一）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读《明史》

明朝自建立到灭亡,前后共三百年的时间。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兴市民文化的矛盾错综复杂。

历史之树万古长青。从明史中,人们既可以找到朱元璋在元末群雄逐鹿中独领风骚的奥秘,又可以从魏忠贤等阉宦的横行中,痛切感受到明末政治的黑暗,既有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封建士大夫的革新精神,又有航海家郑和在中外交通史上树起的丰碑,还有明中后期学术与政治纠缠的复杂。

毛泽东在研读《明史》时,于上述历史事件不同程度地都有所关注,并不时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感悟,有所启迪。他的大量评点、圈注,都是他精思深研,因时就势,活学活用的表

现。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大书,《明史》的卷数仅次于《宋史》,全书共计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近五百万字。《明史》的修纂时间在二十四史中为最长的一部,从清顺治二年(1645)下诏纂修开始,至乾隆四年(1739)刊刻进呈,前后长达九十五年。《明史》又是继前四史之后的一部体例完备、史笔谨严的史学著作。《明史》流行的版本较多,约计有十余种,其中较好的版本有: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是目前最为方便实用的版本。

《明史》继承了中国官修“正史”的传统体例,以纪传为主干,辅之以志、表,但根据明朝的特殊史事,编修者又作了有创意性的体例编排,使《明史》成为一部体例完备、纂修谨严的史学名著。

《明史》为专记明代王朝兴衰的“正史”,治乱兴衰是历代政治家关注的中心,但由于《明史》著者眼光较前人扩大,《明史》中包容了较多有认识价值的材料,成为一部比较成功和完善的著作。





朱元璋是应该肯定的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的 1948 年,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之中再读《明史》卷一、卷二、卷三后,结合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吴晗同志所著的历史学著作《朱元璋传》而提出的自己的一些商榷观点和评语。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 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叵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 1948 年 11 月 24 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 页)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农民

问题》讲课中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为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贯为天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力作之一，于1944年首版，从1954年开始，又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在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表示满意。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毛泽东对“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似乎应当隐恶扬善，放大其光明的一面，这很可能是基于某种政治联想而产生的。1964年，吴晗根据征求来的意见，又对《朱元璋传》作了再次修改。

明太祖，即朱元璋（1328—1398），明朝的开国皇帝，幼名重八，又名光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农民出身，自幼孤贫无依，被迫到皇觉寺充当僧人。元朝末年的时候，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群雄”纷争。1352年，朱元璋到濠州投奔了郭子兴，参加了反元的斗争，由于他勇谋过人，不久便成为“红巾军”中的领导人物。1356年，他率军渡过长江，攻占了集庆（今南京）这一江南重镇。1364年，即吴王位，建百官，立制度，政权初具规模，并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



1368年，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明朝建国后，不久推翻元朝，统一全国。他废除中书省，取消丞相，分封诸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立了诸多典章制度，明太祖为强化集权政治，实行君主专制，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备战备荒为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古君王统治治理天下，不惟有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更需要一帮有智、有识、有胆、有略的大臣谋士顺时应势，及时提出一些积极的良谋良策，以达到安定民心，保证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作用。

明代历史上的许多卓越谋士之中，朱升堪称其中的典范。朱升，朱元璋谋士。元末举人，字允升，安徽休宁人。初任池州学正，后隐居。龙凤三年（1357年）被荐，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采纳。明初任翰林学士。

毛泽东在读《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时，对朱升有较高评价。并结合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不失为合理性的战略性思想主张。



朱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要谋士，他所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思想，对明帝国的创建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于70年代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显然是借鉴了朱升的正确主张。

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一方面处于国民经济的恢复、稳定、持续发展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起者和领导者。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事态的演变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前后，毛泽东已读过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不仅对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民族气节极为景仰，而且更看重和推崇戚继光练兵用兵追求实战效果的思想。这与毛泽东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致的。

戚继光深得毛泽东推崇，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戚继光(1528—1587)，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将官家庭出身。嘉靖三十四年(1555)，



调到浙江担任参将，抵御倭寇的进犯。加以严格训练，这就是名闻全国的“戚家军”，当时抗倭的主力部队。嘉靖四十年（1561），在台州九战九捷。次年福建告急，戚继光前去增援，捣毁了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二年后，与俞大猷合力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了东南的倭患。

张居正很赏识戚继光，总兵官以下全部由他指挥。从此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官至左都督。他严明，赏罚公平，在练兵、制造军器、摆设阵图等方面都有创见，通过建敌台、立车营、用方阵战术等办法加强战备，使这一带多事的边境长期得到安宁。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受到排挤打击，先是调任广东，继而罢官。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止止堂集》等。

毛泽东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毕生有5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

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

1958年至195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为了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各地全民大炼钢铁，普遍实行食堂制，“人民公社制”。一时间“浮夸风”盛行。

正是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以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逆风而上，多次向毛泽东直言进谏，要求制止整治这股歪风。但没有被毛泽东所采纳。

在1959年8月16日庐山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借古喻今，发表了一些自己读《明史》卷二六《海瑞传》后的观点：

……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偏听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见李锐《庐



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309页)

海瑞(1514—1587),琼山(今海南)人,海瑞是明朝著名的清官。在民间,他和包拯一样,事迹广为流传,而且经过加工演义成了许多戏曲节目的主人公,是清官的象征。海瑞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金都御史等职。海瑞为官正直刚毅,治学以刚为主,嘉靖年,曾抬棺上疏进谏,激得嘉靖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后因嘉靖帝死去,遇赦释放。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忠心耿耿,直言敢谏,蔑视权贵,从不阿谀奉承。海瑞一生清贫,打击豪强贪官污吏,安扶贫困百姓,因而深受百姓爱戴。他死后,南京的百姓为此罢市,灵柩运回家乡时,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毛泽东历来主张下级要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错误,提倡党内各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看法,都要讲真话,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曾提出一个“五不怕”的说法,因此,他希望党内干部向海瑞学习,倡导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把《明史》里的《海瑞传》推荐给干部们看,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57年6月,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时,毛泽东就对吴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敢于说真话,向上级提意见时,又说了一大段话,认为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又说历史上讲直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怕封为机会主义,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看过一出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宣传海瑞,就把他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有客气,皇帝看



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回，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泽东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毛泽东在1959年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背景。在反思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会那样一哄而起，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听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反映，或偶尔听到真话也没引起注意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党内迫切需要民主气氛，需要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个心理，事实上他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明白讲了出来。在说完海瑞的故事后，他紧接着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体现毛泽东这时讲海瑞的心理的一个注脚。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的时



候，毛泽东曾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

这里说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后来在8月16日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把海瑞分成左派和右派的心理伏线吧。他喜欢“左派海瑞”，因为：“左派海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的。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无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明史·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

高启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明史》卷二八五是《高启传》。

高启(1336—1374)，明代诗人。字季迪，自号青丘子。元末隐居吴淞青丘。明太祖时应诏入朝，后因事被诛。高启早有诗名，与刘基、宋廉并称。其诗师法汉魏晋唐，笔法细腻，文



字晓畅、韵味深长，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大。诗有《高太史大全集》，词有《扣舷集》，文有《凫藻集》。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也许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启的这首《梅花》。为了查找和印证高启的这首《梅花》诗，毛泽东在两三个小时内接连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三封信：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田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六日八(九)时

(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08—110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从以上三封信可见毛泽东当时阅读这首诗和了解其作者的心情是多么急迫。毛泽东可能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而且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启的这首《梅花》。他先以为是林逋所作，但从林逋诗文集中未查到。然后，他对这首诗的记忆也逐渐明确起来了。待弄清是高启所作后，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又写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梅花》诗原文为：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高启的《梅花》大概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

主和的责任不在秦桧

《明史》卷二八七为《文征明传》。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更字征仲，别号衡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文征明一生未中科举，正德末年，因李充嗣荐举，被任为翰林院待诏。文征明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他少年时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他长于书法，行草、小楷尤精。存世书迹较多，著名的有书苏东坡的《赤壁赋》、《与希古书贴》、《与野亭书贴》等。又擅长绘画，以山水见长，他的书画，名重当代，门人很多，形成吴门画派，与沈周、唐寅、仇英



合称明四家。

毛泽东于1957年6月,约见冒广生和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说到舒湮在抗战时于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感慨,念起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并诗史结合进行评论,毛泽东的评论,指出了宋高宗自白的“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的历史真实性,进而肯定了文徵明不“为圣君讳”,在词里大胆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真实性。

毛泽东评点的全文如下: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若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